



行走的「他者」：錢熱儲現象探析

(1919-1927)

■ 王志偉、夏泉

廣東技術師範大學

錢熱儲，生於1881年，歿在1938年，廣東大埔湖寮人，祖籍福建林安。^[1]他少年時曾接受私塾教育，秀才出身，科舉制度被廢之後，又轉而入學潮州法政學校，^[2]換言之，錢氏既有舊學根底，同時，也有新式學科教育的背景，可以算是一位「亦新亦舊」的學人。科舉制廢除於1905年，其時，錢熱儲已然二十有四，其入讀法政學校的行為，屬於舊士子接受新教育一類。接受新式學科教育對錢熱儲的人生產生了較大影響，錢氏之後的很多社會行為大多都是根基於此。

錢熱儲是一個「小人物」，「小」到鮮有學界專家予以關注或研究。揆諸現存成果，對錢氏在廣東漢劇劇種命名及發展，^[3]錢氏在文化事業上的貢獻等的研究，^[4]是目前僅有數篇論著（藝術類居多）探討的主要取向和路徑，而對錢氏事功、交際及評價等則付之闕如。錢氏長期活動於潮汕地區，^[5]屬於區域性人物，對全國或宏大歷史而言，鮮有大的影響。之所以關注這個「小人物」，主要是因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錢氏身上發生了一個奇特文化現象，即在不同人群中，他均被視作「異己分子」：在日駐潮汕領事的情報中，他是「反日分子」；在潮汕人眼裡，他又變

成了親日「漢奸」；在共產黨或革命群眾的評價中，他是「右派分子」；在國民黨的卷宗中，他卻又被劃為「左派」人士，概而言之，錢熱儲就是一個行走中的「他者」。

「他者」是群體「認同」發生畸變的一種反映，「認同」有助於「自我」和「他者」之間界限的消除，而「他者」的出現則是群體中彼此認同出現了分歧，一部分人被排斥「認同」之外。^[6]考察錢熱儲個人形象（即「他者」）的產生原因，與其和社會互動不無關係，換言之，錢氏個人在參與社會活動時的行為、舉措和思想等，是社會其他人群界定或定位該人形象的主要依據或評價標準。錢熱儲的「他者」奇特文化現象為何產生和形成於何種社會環境，均值得我們深思和研究；再者，對該文化現象

命題對關注，有利於我們探究「他者」界定與實際歷史之間的糾葛與差距；同時，也有助於窺探社會轉型時期，時代「弄潮兒」會遇到怎樣的人生遭際。^[7]

一、「他者」形象問題

錢熱儲身上的「標籤」是逐步疊加的，在形成

摘要：錢熱儲長期致力於改造潮汕，民元始投身於家鄉教育，迭辦報刊，意圖通過新聞媒介啟蒙學生和民眾。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生活於潮汕地區的錢熱儲被時人貼上了不同的「標籤」，成為行走中的「他者」。錢氏這種奇特文化現象的產生離不開時代的「造就」，同時，也與當事人的具體作為不無關係。研究錢熱儲，既可見小人物因應時代潮流，介入和參與社會運動的時況，也可見大時代潮流下小人物無奈被動的命運沉浮，同時，還可以為豁清社會轉型時期文化人因應時代變化，適時作出心理調試及行為調整的路徑或取向提供一個具體實例。

關鍵詞：錢熱儲；他者；嶺南社會思潮

上有一個歷史時期，時間大致集中於1919年至1927年間。在這一歷史時期，廣東省域內較「不寧靜」，具體表現：(1)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迭起，為南方帶來了文化衝擊，社會思潮更新頻率較大；^[8]近代以降，潮汕長期受港澳殖民文化影響，到了廣州「五四運動」時期，因為學生之間的「串聯」活動頻繁，所以，也開始受到廣州地區文化的部分影響。(2) 中俄聯合給廣東增添了新的紅色時代氣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因應產物；^[9](3) 東征和北伐先後興起，廣東是兩次革命鬥爭的發生地或起源地。^[10](4) 客軍掌控粵省政局，為爭奪權勢，粵軍和客軍間矛盾摩擦不斷，^[11]在一系列鬥爭之後，粵系勢力朝著有利趨勢發展。這些文化、政治及軍事等方面的變動，對廣東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生活在粵省的人們（包括錢熱儲）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捲入到了時代浪潮之中。

與其他被動捲入時代潮流的人們不同，錢熱儲因為致力於改造潮汕社會（這一特點在錢氏身上較為明顯，似乎是他「一以貫之」的理念），所以，在時代變動的大背景下，他從始至終都依照自己的認知和方式介入或參與到社會改造之中，而且，這種介入和參與均是主動的。正是因為錢氏在這一時期的行為，成為別人標籤他的主要依據，故而，他才會被目為行走中的「他者」。

早年錢熱儲引起爭議不多，縱觀其時作為，多從事「進步」工作，個人形象也多是以正面為主，譬如參加同盟會，^[12]創辦宣傳革命的報刊——《瀛洲日報》，^[13]以及擔任大埔中學督學等。^[14]錢氏形象發生嬗變的時間的最重要節點應該是五四運動及其以後，其形象形成與其創辦《平報》且在報刊中對社會問題及時事政治發表極具個人色彩的看法、言論或主張不無關係。另外，錢氏與陳炯明系粵軍將領私交甚好，是其「右派」形象形成的內在促成因素。錢氏「他者」形象是由他人「標籤」的，雖然在形成上具有時段性，但是，在影響上卻頗具持續性。

從1919年到1922末，在日本駐潮汕領事看來，錢熱儲是「反日分子」，對日持有較為強烈的仇視或抵觸情緒。1921年1月20日，日駐汕頭領事館代理領事打田莊六致外務大臣內田康哉的報告中說錢

熱儲創辦的《平報》「極力煽動下層民眾不平，對日感情甚為不良」^[15]；「該主筆為市政廳教育局社會教育科長錢熱儲，極力鼓吹社會主義，排日思想」^[16]1922年1月12日，打田莊六致外務大臣內田康哉關於當地新聞調查中說：「刊載排日記事」^[17]。只是到了1923年之後，日本駐潮汕領事才對錢氏的看法產生了改觀，認為錢氏對日「態度良好」^[18]。日方對錢氏印象的改觀並非一朝一夕，與錢熱儲主持報刊長期發表有利日本言論的文章不無關係。聯繫到當時廣東省內的政局及文化生態，錢氏此舉必然招致潮汕地區人們的反感，^[19]在「非此即彼」和「非黑即白」的革命時代，錢氏必然成為潮汕地區某些國人攻擊的對象。

1925年後廣東政局發生重大變化，東征和北伐先後在粵省興起，生活在潮汕地區的錢熱儲當時處在陳炯明系粵軍統治之下，^[20]當聯合的國共與陳炯明系粵軍戰鬥時，生活在「敵佔區」的人們持何種態度，是革命者判斷其陣營歸宿及階級特性的重要依據，東征前後，錢氏形象在「左」、「右」間不同變換即與此有重要關係。「東征」之前，在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新成立的共產黨及革命群眾看來，錢氏屬於「左派」陣營，團粵區委更是在報告中將其視作革命陣營中的一員，曾打算向其捐贈《嚮導》和《中國青年》以為獎勵。^[21]「東征」爆發後，錢熱儲又很快被革命群眾或團體視為反對革命的反動「右派文人」^[22]，招致了各方的批評和責問，「錢熱儲定為梅縣政客，站在右派方面，立場是反動的」^[23]，錢氏更是招致各方的怒罵，「你這一個熱心儲錢的人，愛錢不愛臉，將來總有一天，有錢也買不了你的命」^[24]，更有人建議，「大家集中火力，每人寫一篇以上的文章，一鼓作氣，連續發表，矛頭直指錢熱儲這老傢伙，一定要把他『拉』到全市民眾面前，揭得他聲名狼藉，體無完膚」^[25]。

二、「他者」形象分析

仔細分析錢熱儲「他者」印象，可以發現，錢氏「四不像」形象實際上牽扯到兩個層面的問題，「漢奸」問題事涉民族氣節及民族感情方面，「左派」或「右派」是從革命或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判

斷的，換言之，從民族氣節或民族感情角度看，才會有是否為「漢奸」的判別；從革命或意識形態關照角度看，錢氏才會有階級「左」或「右」上的分別。另外，兩個層面是二元並立關係，其一屬於民族問題，其二則屬於階級問題；民族問題屬於敵我性質，階級派系問題雖然性質上屬敵我性質，但是可以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故而，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從民族氣節或民族感情方面來看，中日雙方對錢氏所持態度主要是從民族、國家的利益角度出發的，判斷依據主要是根據錢氏創辦報刊——《平報》上刊發的言論。日本駐潮汕領事關注錢熱儲，不是因為他本人多麼重要，最主要還是因為錢氏創辦了《平報》，^[26]報刊上發表的言論是日駐華領事每日需要搜集、整理及記錄在案的情報來源。長年累月的信息整理，錢氏與當時潮汕地區報刊創辦者一同進入了日本領事的視線，自然而然地引起了關注，以至於其在私下對錢氏進行了基本定位和評價。

1919年至1922年之間，《平報》發表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中國事實的文章，鼓動中國民眾對日本持抵制態度，《平報》此舉必然招致日本領事對該報刊及創辦者的厭惡，錢氏被視為「反日分子」也就順理成章。推究該時期內《平報》所以集中發表抵制日本言論的文章，雖與錢氏具有愛國立場不無關係，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一直未被學界所關注，即忽視了「廣州五四運動」對當時粵省政情、輿論及民眾感情所產生的重要影響。^[27]廣州五四運動以「排日」為宗旨，以抵制日貨為主要手段，持續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潮汕地區頗受廣州五四運動影響，仇日、抵日和反日是當時廣東民眾共同的感情訴求，^[28]當地報刊也自然而然成為反對日本的「窗口」。在時代裹挾下《平報》對日本必定採敵視態度，發表抨擊文章予以鬥爭，^[29]此舉被國人特別是潮汕人視為同類所為，日駐華領事則目為反日分子，此是情理之中事，並無意外發生。

1922年前後，也是因為《平報》刊發的消息，日駐華領事及潮汕人對錢氏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顛覆性變化，日駐潮汕領事認為錢氏「對日態度良好」，潮汕地區的部分民眾則開始視其為「漢

奸」。1922年，潮汕自然災害頻發，日本參與救災，駐潮汕領事也捐獻資金，支持潮汕災後重建，日本此舉引起了潮汕地區報刊關注，《平報》就是其中之一。與之前「抵日」和「排日」的論調不同，《平報》開始轉向報道日本救災情況，譬如在該年八月十一日第三版上就曾撰文報道說「此次奇災，各國旅汕人多協力助賑，極為熱心，外馬路天主堂邊之日本人協會，亦陸續施粥，送至門前外馬路旁，設定一桌派二人司理洗碗盛粥之事，並高懸一旗，大書日本人協會施粥字樣，附近災民就食頗為不少」^[30]《平報》報道日本救災情況，從職業道德上講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從當時廣東省情、政情及社會輿論而言，是否遵從職業規則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否順從時代潮流，繼續反日和抵日才是其人其性的判斷標準。在輿論洶洶的時代，報道文字包含民族感情與否不是關注重點，是否敢悖時代而動，宣傳利於日本的輿論報道才是問題核心，故而，「非黑即白」的是非觀決定了錢氏必然被其他人定位為「漢奸」的不幸命運。

從革命或意識形態關照角度看，1924年之後，錢熱儲又面臨著被定位為何種階級派系的問題，錢熱儲左派或右派定位的判斷標準主要取決於他人對錢氏對待革命的態度的判斷。另外，所以出現該問題，也與錢氏主持或主辦潮汕地區報刊——《平報》有關，就全國而言，錢氏或者是一文不名，但是，在潮汕地區，因為創辦刊物的緣故，他卻是不能被忽視的地區「名人」。

錢熱儲被視為「左派分子」，與其發表大量以宣傳「社會主義」為主要內涵的文章不無關係，時人曾載錢熱儲「尤服馬克思主義，提倡新思潮不遺餘力」^[31]，同期，日本領事也說錢氏「宣傳社會主義……特別是連載克魯泡特金、馬克思等學說譯文」^[32]。僅存的材料只能從側面印證錢熱儲在《平報》及副刊上發表了不少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至於錢熱儲對社會主義持何種態度並無直接文字證明，因為，當時「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的，不很清晰的」^[33]；孫中山也曾羅列過廣東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34]

分析考究錢熱儲熱衷宣傳社會主義的原因，與當時粵省境內社會主義思潮泛濫有很大關係，

^[35]更為重要的是其時馬克思主義頗為風行，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即是這一時期在廣東建立起來了^[36]，故而，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下，錢氏作為似乎就變得很容易被理解。錢氏宣傳社會主義就被以意識異同為陣營分化的評判標準的左派或早期共產黨人目為「同路人」或者「同志」，但是，他們對錢氏對革命到底持何種態度並不真正了解，或許在時人看來，宣傳什麼社會主義不是問題核心，問題關鍵在於宣不宣傳。^[37]但是，以今日後見之明來看，錢氏與左派或共產黨並非是「一路人」，這也可以解釋錢氏主辦報刊為什麼會在東征開始後發表那麼多篇攻擊革命的文章。

錢熱儲「右派」身份與其東征時段站隊陳炯明系粵軍，發表攻擊和反對工農革命的言論有關。^[38]在意識形態觀照下，革命者大多持「非黑即白」的標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錢氏與革命漸行漸遠，「捏造事實、顛倒黑白、惡毒咒罵共產黨及工農運動，攻擊國民政府」^[39]，使得其「右派分子」形象坐實。至於如何看待和理解錢氏右派問題，有如下三點需要注意：（1）時人所以將鬥爭矛頭指向錢熱儲，可能與錢氏確有反對工農革命的行為有關，今人沒有太多材料證明，不等於當時也沒有材料證明，時人比今人更具了解歷史事實的條件與可能。時人曾說錢熱儲，「在反動報紙上大放謬論，有時更露骨地公開進攻新文藝，……亦給以無恥的污蔑、反動」^[40]而且，還「反對白話文，攻擊新文藝，公開謾罵孫中山，污蔑三大政策，對共產黨更是極盡造謠中傷之能事。他向上投靠軍閥，阿諛拍馬，肉麻之至，對下卻敲詐老實商民，對青年學生則視若仇敵」^[41]，對於這些記載當不是空穴來風。（2）錢熱儲與陳系將領關係較好，此點通過《平報》的文字報道也可予以折射。錢熱儲曾寫過洪兆麟的訊息，一文說洪氏「乘車守時」，另一則消息記載洪「用神奇槍法讓士兵假死，以取民眾信任」^[42]的事情。字裡行間可見錢氏與陳系將領之關係似乎較為親密，或者說錢不厭煩洪氏。這在東征時代背景下，國民大革命激烈的革命潮流中，在革命群眾要消滅陳炯明系勢力的時刻，^[43]錢氏的作為不可謂不是一種「異景」，其主張自然和當時革命群眾所持的「真理」相悖，被視作右派分

子是在情理之中的。（3）曾有文論及過錢熱儲的右派問題，說「因1924年之後《平報》的遺失，無法查閱到錢熱儲究竟發表了什麼文章，表達什麼觀點，對哪些人物關係進行了維護，這些直接重點均無從得知，材料不連貫，證據無法雙面印證，錢熱儲有為右派賣命的可能，但其確定的政治身份還留有可探討的空間」，隨後文字詳細介紹了《平報》編輯裡隱藏有「壞人」^[44]，故意地將相關罪責推到了《平報》機關裡的右派文人身上。^[45]此舉初看似合理，但是，仔細推敲之下，不免有過度推測之嫌，更有為錢氏「脫罪」的企圖。同在一個報刊機構，誰寫文章不是問題的核心，關鍵在於作為持主的錢熱儲如何看待及如何決定文章的刊與不刊，刊與不刊代表著態度，也表明著立場。擁有決策和決定權的錢熱儲對組稿不予否定，足以從側面折射出錢氏當時應該是對東征及國民革命持有「不同意見」，被時人目為「右派」也在情理之中。故而，依據錢熱儲在東征及國民大革命時段的作為，將其歸為「右派」當無可爭議之處。^[46]

不過，無論左派或右派，只是在對待革命或政見上存在差異，是思想層面上的分歧，這裡並沒有絕對的對錯或善惡之分，不能也不應該從革命史觀角度出發，對歷史人物進行「三六九等」地劃分，左派不代表先進，右派也不應該總被歧視或反對。東征軍佔領潮汕後，^[47]《平報》代理編輯丘譽遭到逮捕，政治部擬做出「處丘極刑」的決定，汕頭報界立即發公電予以援救，說他是「一時錯誤，系屬年少不更」，所以要「誼屬同業，請迅設法援救」^[48]，由此足見，時人（特別是潮汕人）對「右派」人物也並非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地痛恨。

三、時代潮流與錢熱儲個人形象

錢熱儲「他者」印象離不開時代潮流的影響，換言之，1919年至1927年粵省政治、文化、軍事及輿論合力形成的特殊時代形勢均對錢氏四不像的「他者」形象的成型起到了左右作用。從這一點說，錢氏的所作所為似乎始終都無法擺脫時代影響，故而，需要將錢熱儲的作為放到時代潮流關照下予以考察。另外，時代潮流雖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個人的



主觀能動性，在滾滾的時代潮流中，錢熱儲也有堅持自己認知的作為，譬如（一）在反日和抵日聲勢漸隆的時期，他主辦的《平報》報道日方捐助潮汕救災消息；（二）在東征時期，支持陳炯明系粵軍，與革命漸行漸遠，也是因為他固執地堅持自我，所以，才會引起持「非黑即白」評判標準的他人對其做出形象各異的判別。

縱觀錢熱儲一生，其足跡似乎從未離開過潮汕，無論是青少年時的負笈求學，還是成人之後的社會活動。舊士子接受新教育的錢熱儲自青年始，就以改造潮汕社會為職志，此點似乎貫穿於他的一生，從創辦《瀛洲日報》時主張「改良社會陋俗，普及國民思想」^[49]，到擔任大埔督學時要「學生應有維持、振興社會之心」^[50]，再到創刊《平報》和《思潮》，直至其晚年改良廣東漢劇，「改造」似乎在他的社會活動是一以貫之的「主題」，時人評價說，「惟君提倡改造獨多」^[51]。錢氏思想隨著時代變化而嬗變，說明他對如何改造社會的認知具有「時代性」特徵，左右搖擺，前後不一，只有「改造潮汕社會」才是他參與社會活動，介入時事政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以改造潮汕為畢生追求的錢熱儲雖然是文人，但是，卻又是一位有自己政見且能堅持自己認知的文人。在潮汕地區各種社會思潮洶湧澎湃之時，錢熱儲更多地是關注該社會思潮能否改造

「潮汕社會」，而對思潮蘊藉的「三昧」並沒有太深的認知，「惟是汕頭方面新文化運動非常之幼稚」^[52]，只要能夠達到「改造潮汕社會」的終極指歸，對各種社會思潮均持「拿來主義」，為我所用，改造我鄉，這是他所以在不同社會思潮中「弄潮」的最重要原因，非如是則不能解釋為什麼他會成為「反日」和「漢奸」印象共存，「左」「右」派別形象並立的矛盾統一體。

潮汕地區位置優越，社會思潮傳入及傳播便利，因此，可以給錢熱儲改造社會提供多種「方法」。錢熱儲是「弄潮兒」，在社會思潮泛濫時期，他有主動認知的行為，並且有利用社會思潮改造潮汕社會的意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也是具有時代悲劇特色的一類典型代表，「其熱烈的願望注定只能落得個蕭索悲涼的結局」^[53]，在社會實踐中，他根據自己的認知，選擇改造社會的「措施」，而且自認為找到了改良社會的「密鑰」，這種盲目性使得他一定時間內與時代相悖，與社會主流漸行漸遠，與革命相抵牾，小人物在大時代潮流中沉浮，「一葉障目」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制約或者妨礙了錢熱儲尋覓到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

結語

錢熱儲是一個小人物，自始至終只是一個生

命個體，他之所以成為不倫不類的「他者」，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他在不恰當的時段不恰當的場合發表了一些「不恰當」的個人政見或在報刊上刊載了與時代潮流相悖的言論，民國社會是各種思潮澎湃激蕩和革命主義盛行，錢氏的所做所為很多時候並不與時代潮流相一致，個別時期甚至還站在「革命」的對立面，譬如1925年東征時期，他以堅決態度支持陳炯明，詆毀農工革命，詆毀東征，這是當時潮汕民眾判定他為異端「他者」的重要根據。在革命年代，「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評判思維被廣泛採用，各社會團體或個人在判斷事情曲直是非時，往往先立「標準」，以己為是，違己則非；從己為友，悖己則敵，這是錢熱儲形象所以淪為四不像的「他者」的主要原因。

錢熱儲一生秉持改造家鄉潮汕的理念，這是他所以堅持積極參加社會事務、創辦報刊及擔任學監的重要原因。錢熱儲改造潮汕主要從兩個維度出發，一個是關注從思想層面啟蒙；另一個關注對象選取為「平民」。注重「思想」啟蒙，作為潮汕地區辛亥革命時期第一批同盟會會員，民元開始就投身教育；創辦報刊，並長期擔「主筆」；晚年投身鐵路建設的同時，又樂此不疲地改良「漢劇」。聚焦「平民」，錢熱儲自始至終都將「平民」作為改造對象，他長期創辦《平報》，報刊常設「平民常識」、「平民俱樂部」及「平民之友」等欄目，其核心意圖就在啟迪平民，爭取平民，改造潮汕平民；他晚年改良的「漢劇」，演唱大多是以平民為對象，種種這些都是錢氏聚焦平民的重要體現。

當社會改造事業和時代潮流糾葛在一起，我們既可見錢熱儲無法擺脫朝代潮流影響的一面，同時，也有其堅持自己認知和固執己見，與時勢相悖的一面。錢熱儲並不是先知先覺者，在很多時候很多問題上並不能「未卜先知」，有的時候還會因為「一葉障目」而不識得「廬山真面」，譬如他認同陳炯明「聯省自治」方針，反對孫中山北伐的想法，所以，才會在國共攜手東征時仍然頑固地支持陳炯明及陳系粵軍。近代廣東社會思潮複雜多樣且呈多變特徵，在面對各種社會思潮時，錢熱儲並非均能夠一一識別其個中「三昧」，很多時候是秉持「拿來主義」，選取思潮中與我有利的部分，

人為忽略或不談及思潮中對我不利的成分，在錢熱儲眼裡，能夠助益改造潮汕才是他關心的問題關鍵，至於思潮蘊藉並不是問題核心。某種程度上說，錢熱儲的人生遭際是在社會轉型時期，無法擺脫時代影響的文化人面對時勢做出不同因應而被時人標籤各異形象的不幸群體的典型代表的真實寫照。

本文系2020年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項目「文化教育與澳門華人研究」項目（項目批准號：JDNJL202001）的階段性成果。

- [1]黃志環：《大埔縣縣姓氏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62頁。
- [2]大埔中學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編：《大埔中學校史(1904-2004)》（大埔：大埔中學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2004年版），第7頁。
- [3]馮光鈺：〈戲曲聲腔的傳播〉，載《黃鐘》1999年第3期。陳志勇：《廣東漢劇與客家文化》，《學術研究》2008年第2期。蕭遜天：《民間戲劇叢考》（香港：天風出版社，1957年版）。丘煌：《廣東漢劇不是源於徽班而是源於湖北漢劇》，《陶融儒樂社六十周年紀念刊》（新加坡：陶融儒樂社1991年版）。謝彬：《嶺南戲劇源流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版）等。
- [4]羅帆：《錢熱儲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潮汕社會思潮》，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6年。按：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對羅帆碩士論文在部分材料上有所借鑑，於此特為致謝。
- [5]按：傳統潮汕地區下轄十縣，大埔名列其中；建國後，大埔被劃歸興梅專區。現在普遍認為的潮汕地區概念形成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包括汕頭、潮州、揭陽、汕尾四個地級市）。本文所說的潮汕概念是指傳統潮汕而言的。
- [6][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頁。
- [7]包括兩個層面：一，社會思潮影響鄉野社會；二，生活於社會思潮洪流中的小人物如何認知，如何在時新時變的社會轉型中做出自己的抉擇。
- [8]王志偉、夏泉：〈廣州「五四運動」特徵與原因探討〉，載《青年探索》2020年第3期，第73-82頁。參見張金超：《〈廣東群報〉與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再研究》，載《紅廣角》2018年第5期，第50-56頁。



- [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頁。
- [10]何應欽等編：《東征與兩廣統一》(台北：「蔣總統」對中國及世界之貢獻叢編編纂委員會，1967年版)，第139頁。
- [11]孫中山：〈覆胡漢民等電〉，載《建國粵軍月刊》(第2期)(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軍系，類別號-84)，第32-33頁。
- [12]陳介成：《大埔客家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頁。
- [13]汕頭新聞記者台灣訪問團編：《潮汕概況》(汕頭：內部發行1948年版)，第16頁。
- [14]羅卓英：《廣東省立大埔中學校史》(紹興：民國印刷所，1948年版)，第5頁。
- [1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汕頭領事館書類機密第5號：地元ニュース調査.大正十年一月二十日。
- [16]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7-1、5-1「華僑學會は華工入國・民國13年東學集會・日華僑特集を取り締まることに反対」2大72-75。
- [17]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汕頭領事館書類機密第二號：「地元新聞調査」は、大正十一年一月十二日。
- [18]田莊六致外務相の内田康哉さんが地元のニュース調査について報告し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汕頭領事館書類機密第二號：「地元新聞調査」は、大正十二年一月十日。
- [19]這一時期需要考慮廣州五四運動對潮汕地區人們思想的衝擊。見廣東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選編：《五四運動在廣州資料選編》(廣州：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1984年版)，第99頁。
- [20]東江戰地通訊員：〈虎門特約通訊〉，載《建國粵軍月刊》(第2期)(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軍系，類別號-84)，第27頁。
- [21]譚小蓮編：《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卷)(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6年版)，第322-327頁。
- [22]廣東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南粵英烈傳》(第1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頁。
- [23]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6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4頁。
- [24]許美勛：《馮鏗烈士》(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頁。
- [25]廣東省婦女運動歷史編纂委員會：《一代英姿》(第1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頁。
- [26]據目前僅能看到的材料，現在統稱的《平報》似乎應該是「平民日報」的簡稱。參閱曾旭波：《汕頭埠老報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2頁。
- [27]廣東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選編：《五四運動在廣州資料選編》(廣州：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1984年版)，第53頁。
- [28]王志偉、夏泉：〈廣州「五四運動」特徵與原因探討〉，載《青年探索》2020年第3期，第78頁。
- [29]趙春晨：《潮汕百年履痕》(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頁。
- [30]〈日本人協會施粥〉，載《平報》，1922年8月11日，第3版。
- [31]陳漢初：《潮史述論》(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頁。
- [3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汕頭領事館書類機密第二號：「地元新聞調査」は、大正十一年一月十二日。
- [3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
- [34]中山合作編：《孫中山社會主義談》(長沙：中山合作，1927年)。
- [35]廣東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1年版)，第136頁。
- [36]陳公博：《寒風集》(甲)(上海：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年版)，第225-227頁。
- [37]花縣縣委黨史徵集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花都黨史通訊》(第2期)(內部資料，1988年版)，第1-4頁。
- [38]汕頭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汕頭地方文化藝術史資料彙編》(第1輯)(汕頭圖書館藏，汕頭：汕頭市文化局，1982年版)，第5-8頁。
- [39]羅國明：《黃埔軍校大傳》(中)(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頁。
- [40]同注[24]，第26頁。
- [41]《李春濤文集》編輯組編：《李春濤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頁。
- [42]〈洪兆麟之乘車道德〉，載《潮汕鐵路季刊》(第1期)，1933年，第156頁；《洪兆麟打靶》，

載《潮汕鐵路季刊》(第1期), 1933年, 第157頁。按: 這兩則材料是洪兆麟軼事記錄, 洪氏已於1925年12月9日(一說7日)被刺身亡。洪去世多年, 錢熱儲還刊發洪兆麟正面形象的文字, 由此足見錢熱儲對洪的態度相對友好。郭廷以: 《中華民國史事日記》(第2冊)(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9年版), 第956頁。

[43] 《第一軍為克惠事告市民文》, 《七十二商報》, 現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微卷號: N0970129, 1925年10月17日, 第5版)。

[44] 按: 當時《平報》的代理編輯是丘譽, 見大埔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大埔縣志(1979-2000)》(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第1031頁。

[45] 同注[4]。該論文關注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潮汕社會思潮影響下錢熱儲形象的「多變」問題。但是, 該文在探討錢氏形象「何以多變」, 「變化的時間節點」, 以及「形象變化和時代潮流之間關係」等問題時均缺乏深入探討。另外, 作者對錢熱儲似有「先入為主」的認識缺陷問題, 有過高評價錢氏之感, 在解釋錢氏「右派」形象問題時也過於委婉或辯解。

[46] 中共汕頭市委黨史領導小組辦公室編: 《潮汕黨史資料彙編》(第1期)(汕頭: 汕頭市委黨史研究室, 1985年版), 第13頁。

[47] 1925年11月2日, 陳炯明系粵軍撤離汕頭(海豐縣歷史文化研究會編: 《陳炯明言行錄》(內部刊行)(海豐: 海豐縣歷史文化研究會, 2004年), 第330頁; 4日, 周恩來帶兵進佔汕頭。廣東檔案館編: 《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編》(廣州: 廣東檔案館, 1992年), 第28頁。

[48] 〈汕頭報界電請援救平報記者〉, 載《廣州民國日報》, 1926年1月6日, 第6版。按: 《平報》被接管後, 在周恩來主持下將其改組為《嶺東國民日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 第90頁。

[49] 〈創刊詞〉, 載《瀛洲日報》, 1910年10月3日, 第1版。

[50] 大埔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大埔文史》(第14輯)(大埔: 廣東省大埔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1996年版), 第205-208頁。

[51] 陳志菩: 《茅屋》(上海: 新文化書社, 1924年版), 第124頁。

[52] 廣東省新聞學會編: 《廣東革命報刊研究》(第1輯)(廣州: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1987年版), 第69頁。

[53] 這裡是借用學人對民國潮汕名人張競生的評價。錢熱儲(生於1881年)和張競生(生於1888年)同出潮汕, 都有按照自己認知介入社會潮流的舉動, 而且, 也均被時人視作「異數」, 這種文化現象為何於潮汕名人中間頻頻出現值得關注。參見江中孝: 〈蓋棺已久而論未定的張競生博士〉, 載《嶺南文史》1998年第1期, 第19頁。

The Walking “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Qian Rechu (1919-1927)

Wang Zhiwei, Xia Quan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Qian Rechu had been devo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oshan since Revolution of 1911 when he started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level in his hometown and creat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 students and mass through news medi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Qian Rechu, living in Chaoshan region, was labeled variously by the people of that time, becoming the walking “other”. This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concerning him resul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at era and his concrete behaviors. Therefore, making researches on Qian Rechu can not only observe the phenomenon of common people, following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volv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movements, but also discover the forced and floating destiny of common people in that era. Meanwhile, a specific example of the educated who have to choose a way or orientation for proper adjustments mentally and behaviorall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can be offered.

Key Words: Qian Rechu, Other, Ethos of Lingnan